

我所知道的陈纳德和陈香梅

黎成德

抗日战争中期，在缅甸和我国云南毗邻一带的上空，出现了“美国空军志愿队”的飞机与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对抗。“美国空军志愿队”成立于1940年5月，由陈纳德担任领队。

1941年秋，我辍学于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考进该志愿队华籍人员管理处，充任英语翻译官，与陈纳德和陈香梅有过一些接触。现将我对他们了解的情况，忆述如后。

陈纳德和美国空军志愿队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美国的大资本家和大军火商，向日本侵略者大量提供贷款，并把飞机、坦克、汽油以及轻重火器卖给日本，日军就用这些武器野蛮地屠杀中国人民。后来，日美争夺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的斗争愈演愈烈，但美国国内在对日态度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有些人主张大量援助中国抵抗日本；多数议员却认为日本国土小、人口少，不敢触犯西方国家在南洋的利益，更不敢打美国，只要给其一些经济实惠，便可以安抚，稳定日美关系；还有部分代表某些财团利益的议员，则主张派有限的美国空军战斗机中队，支援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然而未等这些意见统一起来，日本就向东南亚有些国家发动进攻了。

作者抗战时期曾任美国空军志愿队华籍人员管理处英语翻译官。

1940年5月，德国法西斯进攻法国，原属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半岛，已处于日军炮火之下。9月，日本侵略军在海防、河内一带登陆，法国军队投降，整个越南受日军控制。我国昆明经常受到日机空袭，国民党从海外取得援助的惟一通道滇缅公路，已变成前线，屡遭日机的狂轰滥炸，就连美国及其他国家运往中国的货物亦难幸免。利益所系，危难临头，于是美国在1940年5月，决定派遣现役空军战斗机三个中队共120架飞机，连同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分驻缅甸及我国云南各机场。从此保卫滇缅公路运输和沿线堆货仓库的战斗就这样正式打响了。

当时美国还不敢以美国空军的名义参加对日作战，而是采用“志愿队”的形式出现，即由国民党政府出面，聘请美籍空军组成志愿队，由美国退役空军中校陈纳德、艾尔逊、希尔和空军少校阿康纳分别担任正副领队，英国传教士莫里逊（曾在四川、云南住过）任情报军官，志愿队的中文名为“航空委员会美籍志愿空军总队”，简称美志愿队。

1940年，苏联志愿空军撤走后，国民党微弱的空军力量就更难以撑起梁架了。当日机空袭成都、重庆、昆明和桂林时，国民党飞机虽起飞应战，但多被战败，损失严重，只好避战逃跑。这样一来日机就更加轻狂自信，常常竟以一架单机进行轰炸。日机的猖狂，有两件事可以佐证：一件是1940年，日机出动40架轰炸云南驿机场，这一次，炸毁国民党飞机达30多架。为此，蒋介石异常恼怒，指令处决机场站长，撤消昆明五路司令官张延茂少将的职务。由于这次损失，有关飞行员忍辱受“勋”，佩戴“耻”字于胸前，人称“耻”字大队。再一件是1941年7月某天，日机3架侵袭成都，在郊外疯狂扫射后，居然还在太平寺机场着陆，抢走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旗。1940年前后，日军牢牢掌握着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陈纳德指挥的美国空军志愿队，在缅甸仰光及滇缅公路沿线

与日机对抗作战，接连取得好的战果。虽然从全局讲，当时日军在整个远东和东南亚地区仍占上风，但美空志愿队使用了比日机先进得多的 P40 型和 P43 型美国战斗机，又由于在技术技能上比日军略高一筹，因而在局部地区扭转了被动的局面。

日军侵入缅甸时，驻缅甸英军只有一个旅，防守力量薄弱，加上缅甸人还想赶走英军取得独立，因此美空志愿队决定将总部迁至昆明。此前，日军已占领河内，而从河内到昆明空距不到一小时，这样，昆明就经常受到日机的日夜轰炸。当美空志愿队于 1941 年 7 月迁到昆明时，城内各街道和国民党航校、机场都被日机炸得破烂不堪。总部就设在巫家坝机场侧航校内的破屋子里，云南省政府把昆华师范学校校舍作为总部第一招待所。随后，国民党空军五路司令官、航校教育长王叔铭（黄埔一期，曾在苏联哈尔可夫航校毕业），也把他的司令部和航校未被炸毁的房子拨给美国空军志愿队。同时，王叔铭还挑选会讲英语的女大学生到空军各单位去当秘书、翻译官和打字员。此外，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也选派一名能讲英语的女记者，频往巫家坝机场美国空军志愿队战报部采访，她就是后来同陈纳德结婚的陈香梅女士。

1941 年 8 月，日军由河内、海防等原法军基地出动 100 多架飞机，飞到云南的沾益、昆明、呈贡各基地挑战，想一举消灭美国空军志愿队。志愿队分别从各机场起飞迎击，经过一场搏斗，共击落日机 47 架，志愿队损失 17 架。日空军不甘失败，此后又多次袭击昆明等地，每次均遭痛击。到了 1941 年 10 月，日机就不再来云南轰炸了。对此，国民党各报大肆吹捧美国空军志愿队，将其封为“飞虎队”，而且美国及印度的一些报纸，也对“飞虎队”大吹特吹。可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分子，对此并不感兴趣，坚持反对美国政府派志愿队介入中日战争，还主张召回其志愿队。他们大骂陈纳德是投机分子，指责陈破坏日美友谊。这样，作为传奇式人物的陈纳德名气就更大了。

陈纳德，1890年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他的父母都是法国移民的后代，陈纳德能讲英、法、德三种语言。我国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因在美国空军退伍后又失业而来到远东，经宋子文介绍给蒋介石，遂被国民党政府聘为航校教官，后又担任总教官、空军总顾问。

我认识陈纳德是在他当了美国空军志愿总队正领队以后，我作为他的译员。他喜欢打猎，每到星期天他就开着吉普车，叫我一一道去沾益、松林镇等地打野鸡和麂子。他喜养小金狗，在昆明时，王叔铭曾以高价买来小金狗送给陈玩。蒋介石对陈纳德十分信任器重，对此陈常怀感激之情。蒋介石经常通过宋美龄把夸奖陈纳德的一大堆好话向美国政府转达，并表示对美国政府的感谢。而且蒋对陈也不吝提拔，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将陈由一个空军中校直线上升为空军中将。难怪美国一些军人对陈的官运眼热！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日军大举偷袭美军重要海空基地珍珠港，美国蒙受了重大损失，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覆没。次日，美国对日宣战。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决定将美空军志愿队改组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第二十三大队，任陈纳德为大队长，并陆续增派飞机和人员前来中国。这样，陈的志愿队就由原来的三个中队增加为七个，其番号是74、75、76和81、83、85中队，另有一个315空运大队。后来，陈的二十三大队又扩编为美国十五个航空队之一的第十四航空队。

由于日机多次受挫，从1941年秋开始，日军很少派飞机到昆明袭扰。许多被炸毁的房屋也陆续修复起来，昆明市面逐渐恢复正常。这时的陈纳德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极大重视。这年9月，蒋到昆明时，就专门宴请陈纳德及全体飞行员，以示抚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紧进攻东南亚，不久，香港、泰国、缅甸及南洋群岛，先后均被日军侵占。美国政府为了报复日

军，一方面利用中国为基地，大大扩充其在华空军，四处扩建大型机场；另一方面尽量给国民党政府输血打气，除提供贷款外，还为国民党空军培训飞行及地勤人员。

陈纳德当时认为打败日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减少美国飞行员的伤亡，报请美国政府尽快帮助国民党训练空勤人员，迅速提高国民党空军的战斗力。后来美国的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城陆军航空队和得克萨斯州海军航空队各航校，代培中国空军人员，规定 18 个月为一期，学习驱逐机和轰炸机操纵飞行等技能。

国民党昆明航校当时有 300 多名飞行学生，他们是从川、陕、云、贵、湘诸省招考进来的高中生。这批学生被批准赴美学习飞行作战技术，同去的还有 18 名翻译人员。我的父亲早先在成都英人主办的基督教堂“内地会”当雇工，我小时就从洋人那里学会许多日常生活英语口语，后来又在成都私立金陵大学英文系和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由于我的英文会话基础较好，所以也被派往美国。1942 年 3 月，我们由昆明启程，经印度洋和非洲，越过大西洋到达美国。当时，我被分派在菲尼克斯航校为中国学生当翻译。

1943 年 9 月，在美航校学习的第十四、十五、十六期中国学生 100 多名结业回国。他们当中，学战斗机的约有一半人，其余是学轰炸和侦察的。虽然基地指挥官雷依斯少校劝我留下来，为后去的中国学生服务，但被我婉辞了，仍随学生回国。原因是，当时美国的一些白人很歧视中国人，视中国人为有色人种，无论在公共汽车、电车上，还是在酒吧、餐厅，都有人对我们“另眼看待”，实在叫人无法忍受。

回国以后，学生们全部编在“中美混合空军大队”，我也在这个大队充当译员，大队长由陈纳德兼任。此时他已由准将荣升为少将。

“中美混合空军大队”使用的飞机，由美海运到印度，再由中

美飞行员接机驾回，分配到昆明、沾益、呈贡、云南驿、桂林、零陵、柳州、安顺、衡阳等地机场。这时国民党空军原有的飞机，因不能作战，已全部入库。后由美国陆续供给，其总数不过 80 架 P43 型大头飞机。可是陈纳德志愿队的飞机则越来越多，并为此而日夜赶修机场。

1945 年上半年，美国当时最重型轰炸机（即 B29 空中堡垒）已经生产，而且最先在中国战场使用。不过 B29 机是由美国斯特拉特梅耶少将指挥，总部设在重庆及新津机场两处。这个机队还不断对台湾及东南亚等地的日军军事设施进行轰炸。之后还协同西南太平洋美 B29 空军机队对日本东京等地实行“穿梭轰炸”。不久，第二十一轰炸机总队也受陈纳德指挥。记得那时在中印缅战区的美机总数，约在 1500 架至 2000 架之间，按说数量不少，但与美国投入欧战的机数相比，就显得差远了。

陈纳德虽是亲蒋的，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无能，不堪一击，屡屡失败，使他不免感到失望和气愤。1944 年，国民党的“中央军”在湘、豫、鄂前线，被日军打得一败涂地，一直溃退到贵阳东南 18 公里处，使美国一些空军基地沦落敌手，陈纳德不少部下成为日军俘虏。陈纳德对此十分不满，当美军中印缅战场总司令史迪威建议，依据租借法案把运到中国的美造武器，平均分给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各抗日军队时，在华美陆空军将领中，陈纳德是最先签名支持史迪威将军的人。

由于史迪威同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以停止抗日为讹诈手段，通过罗斯福总统赶走了史迪威。但罗斯福仍让史迪威做太平洋美军前线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负责指挥美国部队在菲律宾登陆。蒋介石赶走史迪威一事，使中印缅战场的美军官兵非常气愤，一些人大骂蒋介石是流氓、混蛋、独裁者，是中国的希特勒。当时同我在一起的美军军官白恩斯工兵上校气愤地说，这件事是美国建国以来最丢脸的事件，只是大敌当前，美国也无可奈何。史迪

威因长期在条件艰苦的缅甸北部原始森林及崇山峻岭指挥作战，患了肝硬化症，不久就病死在太平洋塞班岛美军医院里。曾经赶走史迪威的蒋介石，这时却又假惺惺地唁电美国政府，对史病逝表示沉痛哀悼，并把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由此可见，蒋介石对付他的对手，即使是所谓“盟国”的高级将领，也无例外地玩弄两面派手法。

陈纳德在史迪威离华后，为了自己以后在中印缅战区立足，处处巴结讨好当时美国新任驻国民党政府大使赫尔利少将，执行美国扶蒋反共的政策。陈在日投降前，已升为中将，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空军离华，陈纳德也返回美国。^①

在我国解放战争期间，陈纳德又于 1947 年来到上海，充当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空运大队大队长，并兼任国民党航校总教官。他为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效劳，积极空运人员和物资到内战前线，充当了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不光彩的角色。1949 年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推翻，陈纳德由广州去台湾，最后返回美国，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中央社记者陈香梅

1941 年 7 月到 1942 年 3 月，我在美志愿队队部任少校英语翻译官，其他几个译员是我西南联大的同学，我们都住在昆明东南九公里的巫家坝。这是国民党航校所在地，陈纳德志愿队总部就设在这里。当时，昆明各报社纷纷派记者到志愿队来采访，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记者陈香梅，也被派来采访志愿队的消息。

1941 年 10 月的一天，我坐在志愿队队部门口的长椅上看报（那天我不当班，但为了想多练习英语，不当班时也时常到值班室

^① 据叶公超《陈纳德将军悼词》说，陈于 1945 年 7 月卸职返美。

看英文书报，找洋人聊天)。10点钟左右，来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她个头不算高，但很文静，衣着简朴，穿一件合身的蓝色阴丹士林布旗袍，看其打扮像一个穷苦的女大学生。她用英语问我：“哈啰！老弟，你是翻译官吗？”

我回答说：“女士，是的，我是志愿队翻译官，你有什么事吗？”

她马上用很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我叫陈香梅，中央社昆明分社外勤记者，我从今天起经常要来志愿队队部采访消息，我们社给我有正式介绍信，也有英文的翻译附件，请交给队部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你要会见陈纳德上校也可以。很不凑巧，今天他同希尔中校驾北美型教练机到沾益美军基地去了。只有新闻发布值日军官莫里逊在家，他是英国人，是英国内地会的传教士，会讲昆明话、四川话、北京话。另外一位是美国人，叫司密斯·丹尼尔，美国得克萨斯州人，他对人很客气，不会讲中国话，不太了解中国情况……

陈说，今天我最好见见他们，同时把随身带的介绍信交给他们，今后有什么事好直接同他们取得联系。随后我便引见她拜会了那两个“洋人”，因陈香梅会说英语，不需要我翻译，谈了10多分钟就告辞了。

陈香梅对我说，她是外勤采访，不作夜班，平时工作比较忙，当然空闲的时间也有，可以自由支配。她当天是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到小街子，走半里路到巫家坝的。我告诉她，回昆明城可搭下午5点30分由呈贡县开往昆明的火车，也可以搭航校每天三班的交通车，甚至可以搭美志愿队的吉普车。她说：“我不想搭美国人的车。”当天，我还介绍陈香梅认识了航校内的两位女话务员，她们是重庆青木关中学的学生，被招录来航校的，在航校教育长办公室负责守电话及收发公文。

自那次以后，陈香梅就是巫家坝的常客了。当时，人们不喜欢看《中央日报》，因为它不是谎话连篇，就是一些官样文章。但

该报有一位署名“香梅”的记者，经常发表一些有关志愿队作战情况的报道和社会新闻，内容活泼有趣，颇能吸引一些读者。这位“香梅”就是陈香梅。

巫家坝除美志愿队驻扎外，还有中国航空公司及欧亚航空公司的“昆明港”之称呼，那是抗日时期通往印度及欧洲、非洲、美国等地惟一的中转站。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大汉奸叛逃时，就是从巫家坝乘机外逃的。巫家坝经常有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出入，他们也是陈香梅采访的对象。

由于陈香梅经常到巫家坝采访，我们越来越熟。她对人客气爽快，年龄比我稍大，我们都叫她陈姐。当时志愿队的翻译都承认她的英语水平高，甚至超过了昆明地区所有的英语翻译官，这就引起了航校教育长王叔铭的注意。据航校参谋室主任徐国屏告诉我（徐国屏系军校八期、航校三期毕业，王叔铭很信任他，1949年由南京逃台），王教育长想成立一个英语口语训练班，打算聘请陈香梅任教，如果陈小姐愿辞掉记者工作，可以任航校的英语教官，或者做王教育长的英文秘书。我把这些话转告给陈香梅，她断然拒绝了，并说：“我进入社会的时间不长，但通过当记者，接触过不少这类大官，他们的臭架子，给我的刺激太深了……”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政府对日宣战。同时宣布贷款5亿美元给重庆国民党政府，并将美国空军志愿队改组为美国正式空军部队。接着，美国原驻印度的第十航空队也调来云南。美国政府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征集大批民工及军队，加紧扩建和新建昆明、呈贡、保山、楚雄、沾益、昭通、杨林、羊街、新津、白市驿、云南驿、衡阳、桂林、赣州、衢州、芷江等20多个机场，以便接纳大批美国空军，对此，国民党高级官员无不欢欣鼓舞。同时昆明、成都、重庆、芷江、桂林等地的营造公司、机场工程处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国民党的高官与奸商互相勾结，借机营私舞弊，大发“洋财”。据陈香梅后来告诉我，她

曾写过一些揭露性的文章，并用化名在昆明《朝报》、重庆《新民报》上发表。

1942年2月的一天，陈香梅到巫家坝采访，午后返回昆明，我因进城办事，同她结伴而行。那天天气很好，照陈女士的提议，我们沿滇越铁路步行，边走边摆龙门阵，谈得很投机，不仅谈了各人的身世，而且也谈到了对时局的看法。现在回想起来，有些情节还能记得比较清楚。

据陈香梅说，她童年时代是在北平度过的，她原籍不在北平，而是在中原某地（具体地名已忘），后来迁居广东。她父亲先后在中国大学、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英文讲师、教授及系主任。由于父亲的影响，陈香梅从小就喜爱学英文，逐渐掌握了相当水平的英语笔译和会话能力。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香梅随全家逃难，先后到过武汉、长沙、衡阳、桂林、贵阳，最后到了重庆。她说在重庆举目无亲，无人能依，仅有的一个亲戚，因为“思想左倾”，被国民党关进了监狱。

陈还告诉我，她进中央社是在重庆考取。现在当外勤记者，每月收入不到200元，还要给一些穷亲友寄一点。从言谈中可以看出，她对当时社会穷的太穷、富的太富的不合理现象不满，对知识分子、公教人员、中小商人和农民的处境深表同情，对那些达官贵人、富商巨贾荒淫无度、挥金如土的生活感到愤慨。她说到昆明已近两年，从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中发现，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从省级行政机关到基层保甲，无官不贪，无吏不污。这样的政府怎能担起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任呢？她说，作为中央社记者，她只能为重庆中央政府说话，然而自己内心是痛苦的。如果离开这个工作，就要失业。固然也可以当英文教师，当英语翻译，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里，谈到出路，女人总比男人困难得多。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我一个女孩儿家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是为了消除内心的烦恼，求得良心的安慰，我才

向昆明《朝报》投寄批评社会及揭露黑暗的文章。

陈香梅还谈到了对美空志愿队的印象，她说，志愿队的许多美国人作战勇敢，工作刻苦认真，大部分军官是很有修养的。但一些年轻士兵行为不检点，放纵轻浮，有些下流习气，这是难免的。她的看法是，美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现在的科学技术很发达，几十年后不知又进步到什么程度。她说，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那么一天能去美国上大学。

陈香梅当时住在昆明护国路中央社昆明分社职员宿舍里，同住一间的还有另外三个女职员。房间面积不大，光线也不好，房内安放两张条桌，她和社会里的校对员共用一张。桌上摆着几十本中、英文书籍和杂志 其中有《红楼梦》、《唐诗》、《聊斋》、《水浒》、《三国演义》、《莎氏乐府本事》和《生活》、《时代》、《读者文摘》等。由此可以看出她阅读书籍的兴趣很广泛。

有一次，我和陈香梅去大观园游览，发现她不仅英文讲得好，而且对唐诗、宋词也很熟悉。那天她一口气背诵了唐诗 10 首，其中包括白居易的《长恨歌》及《琵琶行》。当时，她还一字不漏地将《长恨歌》译成英语。

1942 年夏，陈香梅离开中央社昆明分社，到美空志愿队当陈纳德的英文秘书，后与陈纳德结婚，抗日战争胜利后，就偕同陈纳德去美国。

爱国民主老人陈叔通

寿墨卿

北京成贤街有一座古建筑，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叫做孔庙。走进孔庙的大门，就看到门内左右两侧排列着 198 座高大石碑，这就是记载元、明、清三代 51624 名进士的题名碑。其中有一座是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 年）科的碑，碑上刊载着进士 315 人的姓名。其中第 2 甲第 38 名是浙江省仁和县人，他叫陈敬第。

追求维新 东渡日本

陈敬第字叔通，辛亥后以字行。1876 年 8 月 7 日（清光绪二年六月十八日），出生于杭州府仁和县的一个书香世家。杭州习俗以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他的生日在荷花生日前六天，因而平生以“清净天成熟与伦”^①的高洁品质来勉励自己。

父陈豪，字兰州，号止庵，清同治年优贡，曾任湖北省房县、应城、蕲水、汉川等地的知县，为官清廉，有政声。兄汉第，字仲恕，和他一起在日本留学，工诗画；民国初年，曾一度任总统

* 作者曾任全国工商联办公厅副主任，后为全国工商联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① 见《百梅书屋诗存》。以下引诗凡未注明出处的，皆引自《百梅书屋诗存》（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

府秘书和国务院秘书长；袁世凯称帝时，即避居天津，参加反袁运动；袁氏死后，先后担任清史馆提调和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等职，有名于时。

陈叔通幼承家学，在经、书、古文、诗词上用过功夫。12岁就与兄汉第同读《史记》、《资治通鉴》、《文选》等史籍；早年就考取秀才，补了廪生。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清廷朝野人士痛感国势危殆，急谋挽救之策。维新运动虽然被慈禧扼杀，但维新余波仍然荡漾不绝。1904年（光绪二十八年），清廷废止八股文，改以策论取士。陈叔通就是在当年的策论考试中中考中举人的，次年，他又在全国会试中考取贡士。接着殿试中式，赐进士出身；朝考中式，授翰林院庶吉士。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改授翰林院编修。

他同情康、梁，醉心维新，有“维新万口说津津”之句。要维新，就得向外国学习，当时清廷派往日本学习的学员特别多。陈叔通就是由清廷进士馆资送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的。他于1904年夏东渡日本，于1906年夏毕业后回京供职。一年以后，调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他以民选议员在清廷资政院任职。

他热心社会改革，在杭州办学校，办报纸，提倡妇女解放，反对缠足恶习。他是杭州女中和私立安定中学的发起人之一，又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公余之暇，他还撰著《政治学》和《政法通论》两书，于辛亥革命后出版。

在辛亥革命以前，他是“宪友会”会员，主张君主立宪政体。但他同情革命，和革命党人颇有往来，特别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有深交。那是1903年（光绪癸卯年）他寄住在北京西珠市口仁钱会馆的时候，陶成章曾两次潜入京师，到会馆里和他密谋替徐锡麟捐资买爵，以便乘机起义事。可是1912年1月，陶成章从南洋回国不久，被陈其美派人暗杀。陈叔通惊闻凶讯赋诗悼念，诗曰：

密图买爵荷咨询，珠市匆匆岁转轮。才入国门凶问至，盖

棺饮恨目犹瞋。

革命志士饮恨泉下，死不瞑目；他回忆往事，悼念不已。

民国初年热心政党活动

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他由浙江省推选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当时国内政党林立，纵横捭阖，改组频繁，都想在国会中占据优势。以同盟会为基础的国民党组成，属于国民党籍的议员将近 500 人，约占国会议员的半数。陈叔通也是热衷于组织政党的一人。他和黄群（溯初）共同发起，把陶成章生前领导的光复会改组为民国公会，接着又与籍忠寅领导的国民协进会和黎元洪领导的民社合并为共和党。合并以后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尚不足 300 人，仍然不能与国民党抗衡。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共和党又与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民主党和以章太炎为首的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等为理事，在国会中形成与国民党对峙的局面。

当时袁世凯利用进步党以抵制国民党，进步党人也企图利用袁氏地位以扩充政治势力。但袁氏蓄意实行独裁，不愿受任何政党的约束。在强迫国会议员把他推上大总统宝座以后，即把政党视为赘疣。1913 年，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袁氏即下令取消国会中国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开不成会，形同虚设。进步党议员虽未被逐，但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到了 1914 年 1 月，袁世凯终于下令解散国会，连一向支持他的进步党人也丧失了议员资格。宦海多变，政局诡谲，陈叔通决心改弦更张，从事实业。

反对袁世凯帝制

国会解散以后，袁世凯下令组织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成立约法会议，废止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又成立参政院，实行大总统独裁。袁氏对于拥护自己的死党和比较有名望的进步党人，采

取羁縻手段，分别赐以高官厚禄，对陈叔通也不例外，但被拒绝。陈叔通早已风闻袁氏有帝制阴谋，曾与梁启超密谋反袁策略。1915年年初，袁氏帝制野心日益暴露，梁即避居天津。当时陈叔通还担任着《北京日报》经理职务，他感到在袁氏压迫下，报纸是办不下去了。国会既已解散，也就决定辞职离京。同年8月，替袁世凯筹备帝制的“筹安会”公然锣鼓登场了，陈叔通也就离京南下，任职商务印书馆。同时，他在上海马霍路（现黄陂北路）德福里租赁房子作为反袁的秘密联络点。

袁世凯只做了83天的皇帝，在举国一致的声讨下，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延至6月6日就忧急身死。陈叔通有诗云：

环瞩金陵似拱辰，紫花印忽电传频。孔璋先遁曹瞒死，蚁梦俄空未九旬。

韬光息影 从事实业

吾生未半岁蹉跎，鬓发侵寻已渐皤。积悔讵成今日是，纵谈时有少年过。

旧书丛里蟬招隐，部树阴中鸟弄和。莽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

这是1915年陈叔通弃政从商时题为《吾生》的一首誓志诗。

早在辛亥革命这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菊生，维新党人）曾邀陈叔通进该馆工作。当时他志不在商，没有应邀。民国元年后，他到北京担任国会议员。当时他对国家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而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以期施展一生抱负。但是党派纷争，尔虞我诈；袁氏窃位，国会解散；南北分裂，强邻压境；国家处境十分危殆，国计民生日益凋敝。莽莽神州，漫漫长夜，看不到曙光；忧心如焚，问天无语，找不到答案。岁月蹉跎，两鬓渐白。正在歧途彷徨的时候，张菊生一听到国会解散的消息，就

去电邀他进商务印书馆工作，促成他下了从事实业的决心。“旧书丛里蟬招隱，邻树阴中鸟弄和”，表达了他从事文化出版事业后的愉快心情。

当时，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大的一家出版商，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陈叔通进馆以后，发现三所各自为政，缺乏密切的联系。他建议在三所之上设立一个统一管理机构，改变三所互不相关的隔绝状态。经过多次协商后，他的建议被通过了，正式定名为总务处（以后改为总管理处）。总务处于 1915 年 10 月成立，成为该馆最高行政决策机构。他担任了处长职务，逐步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从而使各个部门和各个科室之间密切了工作联系，按章办事，循序渐进，避免了脱节现象。以出版新书为例，从计划、编审、印刷到发行，一环扣住一环，好像一条流水作业线，做到每天出版新书一种，一年 365 天，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当时该馆存书，难得脱销，也很少积压。这种科学化管理制度，是在他进馆以后逐步完善起来的。

陈叔通进商务印书馆任职将近一年，帝制失败，袁氏身死，黎元洪代理大总统职，国会复会。1916 年 8 月，陈叔通向该馆请假，赴京参加国会会议，1917 年 3 月复回馆任职。同年 6 月，国会再度解散，从此他终止了议员生活，专心在该馆任职。1920 年底，他提请辞职，经董事会挽留，继续任职一年，终于在 1921 年底离职，但仍担任该馆董事，还一度成为董事会的领导成员。

陈叔通离开商务印书馆以后，应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的邀请，担任该行驻行常务董事。他处事谨慎，工作认真，从不利用职权地位谋取个人私利。他从不和别人投资合伙或担任其他工商企业的董事、监察人等名义，因而一生未卷入任何工商经济纠葛，在当时是一位卓有声誉的金融家。

陈叔通虽然在出版界、金融界先后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他仍然认为“年年生日同虚度”。为什么？“满地干戈真火热，中年

鬓发又霜侵”。当时军阀交战，生灵涂炭。他忧国忧民，百忧萦怀。

为了消愁忘忧，他只好寄情花木，寄情山水，足迹踏遍东南、西南各地名山大川，留下了志游诗近百首之多。

陈叔通从 1915 年从事实业后，经过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两个时代，对于当权者始终没有存过任何幻想。他拒绝当局一切邀请，立志不再做官。他在游严子陵钓台时赋诗道：“附凤攀龙徒取辱，何如大泽一羊裘。”正因为不愿“附凤攀龙”，所以他又把书斋命名为“有所不为斋”。

日军侵略 痛感河山破碎

九一八事变后国事日非，日军进侵益急。到 1937 年卢沟桥畔一声炮响，爆发了全面的战争。当时陈叔通与夏敬观同居莫干山，他给夏敬观的诗中有句道：“弥天兵气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这年他已是 61 岁的老人，从诗句中可以窥见老人涕泪交流的悲苦情境。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不胜愤慨，曾发出了“一误再误惟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严厉指责。

叔老从 1915 年弃政从商以来，24 年中 5 次迁居，住屋愈迁愈小。1939 年，他迁居吉羊村，有友人来信问移居近况，他赋诗作答：

岂意到衰迟，乃复厄阳九。无国自为民，有仇孰为后？

此痛正难言，倏然丧家狗。纵使得寄生，形神已沮怵。

破闲徒咏诗，涤愁且饮酒。剥复著羲经，忍死观厥后。

叔老以迟暮之年，遭受亡国之痛，形神沮丧。但他相信剥极必复，所以要挣扎活下去，盼望胜利的到来。他抱着沉痛心情，磨砺意志，以保持晚节自誓。当时敌伪一再挽人邀他出来担任伪职，他杜门谢客，坚决拒绝。1938 年，他在给李拔可的诗中写道：“眼底兵戈今何时？相期珍重到晚节。”对于投敌叛国的汉奸，他加以无情的鞭笞。在《书海藏楼诗后》中写道：“聊且快一朝，遑计唾